

的欲望無法讓纏足習俗延續、發展上千年。於是在最後一章，作者試圖藉由分析陪葬織品、醫案、日用類書、俗文學和法律案件等多樣化的材料，將傳統婦女「身體的無言呈現」連接到她們的內心世界。在這一章，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女性欲望：對於「身體自身」的呵護，對社會目光的敏感，對於同儕競爭的焦慮，以及對於地位流失的恐懼。作者認為，纏足的存在，對於女人本身而言，這還是自尊的一種具體體現。傳統婦女的隱蔽而模糊的世界在這樣的解析中，開始慢慢浮現那依稀可見的輪廓，讓我們得以探知。

最後高彥頤在結語中表示，這本書並未給出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或是一段簡潔的敘事，因為並不是把各個部份簡單地相加就會成爲一個完整的纏足的故事，而必須在各種文本和實物檔案的不一致、重複和遺漏中探尋纏足的歷史。而實際上，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建構一部綜論性的纏足史，而只是針對漫長的纏足歷史中她認爲有趣的文本和課題提出自己的解讀，並希望藉此創造一個開放的空間，讓每位讀者不僅可以形成自己的見解，而且還願意不斷地進行省思。

總而言之，本書通過對豐富的材料解析，對看似毫無爭議的纏足的歷史進行了重新的定義，顛覆了以往固有的纏足認知。作者在書中強調婦女在生活世界中展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引領我們將注視的焦點從「男性書寫的文本歷史」，轉移到「女性歷史的身體書寫」，具有「典範轉移」的作用。相信這本書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都將是纏足史的權威之作。本書取材豐富，引用、參考各種類別的史料，包括文字、圖像和文物，許多是長期受忽略的史料，使本書更具說服力。同時，作者對史料重新解讀的重視，也深具啓示作用。

唐金英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楊國楨，《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9月，388頁。

《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全書共分三篇，第一篇「海洋發展與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第二篇「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與海洋史學」，第三篇「明清海洋史研究」。此書是近10年來作者對中國海洋史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是其構築中國海洋史學理論的心血之作，從中我們或可瞥見中國海洋史學發展的端倪和未來。

作為中國海洋史學的宣導者和奠基人，近年來，楊國楨把與海洋史及其海洋史學視野下的相關概念細細打磨，多方論證，最終清晰地構建這個學科的理論基礎。他認為，海洋史是海洋視野下一切與海洋相關的自然、社會、人文的歷史研究，從理論上說，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態變遷的歷史、人類對海洋的開發和利用的歷史、以及海洋人文社會發展的歷史。此書前兩篇中，作者通過一篇篇或長或短的精闢嚴密的論述，不僅分析了當下中國海洋研究的現狀，還對學界常用的有關海洋的概念進行了討論，尤其是對海洋人文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中的海洋區域、海洋經濟、海洋社會、海洋文化等基本概念進行了嚴密闡述。這些概念區別於以往經濟學、海洋學、地緣政治學等學科領域的解釋，都帶着鮮明的人文色彩。比如，海洋國家，一般指的是海洋沿岸國家或者島國。楊國楨將其放到海洋史學的視野後，給出了一份全新的人文學科定義。他認為，海洋國家是海洋文明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不能完全等同於海洋沿岸國家或者海洋島國。「海洋國家一般是海洋區域社會經濟力量增大，對全國社會經濟產生一定影響後出現的。」（頁24）他指出「海洋國家」要有幾個「指標」：海洋發展的目標形成國策，有向海洋開放的經濟社會文化運作系統。「比如英國，是近代的海洋國家，一度是全球最大的海洋國家，但在古代並非如此，只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島國。中國在宋、元和明前期，可以算是一個海洋國家，但後來官方從海洋退縮。喪失海洋國家的地位。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海洋發展成爲基本國策，才重新躋身海洋國家的行列。」（頁24）

如果說第一篇，楊國楨是在構築人文海洋研究的基礎、描繪人文海洋學研究的藍圖的話，那麼從第二篇的後半部份就開始了人文海洋研究的微觀考察，勾勒了一個立體的海洋中國。從「宋元泉州與亞洲海洋經濟世界的互動」到「明清海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從「16世紀東南中國與東亞貿易網絡」；再從「中國船上社羣與海外華人社羣」到「禁煙運動中的粵海關與沿海貿易」以及「道光朝中西貿易的變化及其影響」；楊國楨立足海洋人文之上，以獨特史學眼光，爲我們釐清了中國海洋觀念的發展脈絡，如果說，人文海洋研究是一片葉子，那麼上述篇章，就是這片葉子清晰的葉脈。作者在著作中強調「海洋史學與原有涉海專門史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以海洋爲本位的整體史研究，在於它以海洋活動羣體爲歷史的主角，並從海洋看陸地，探討人與海的互動關係，海洋世界與農耕世界、遊牧世界的互動關係，從而形成全新的史學觀念。」（頁105）通過楊國楨一篇篇史料詳盡、環環相扣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無論國家推行積極海洋政策的宋元，還是時開時禁、

最後嚴格海禁的明清時期，中國的海洋傳統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國人對與海洋的征服也不會間斷過。即便是在清代，中國失去了通過海洋實現社會轉型的發展機遇，但海洋傳統在沿海地區仍有頑強的生命力。中國的海洋文明更多地體現在民間的海洋活動上，雖大多數情況下處於邊緣位置，未能進入精英主流羣裏，但中國自始至終「既是東亞的大陸國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國家，歷史發展兼具陸海兩個方向。這兩個方向的抉擇和互動，貫穿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頁113）並且通過與東西方的交流活動，中國的海洋文明對於亞洲乃至全世界一直都在產生影響。

在第三篇，楊國楨通過大量歷史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和證明，海洋人文研究與陸地人文研究的不同之處。以鄭氏集團的研究為例，楊國楨以翔實的史料為依據，考察了當時的社會生態環境條件，確定了鄭芝龍海商集團的性質，把一直以來混淆了的海寇與海商、合法商人與非法商人、官商與私商的界線重新廓清，指出了歷史研究中把農業社會的組織原理套用到海洋社會中的錯誤和局限。這也正說明了楊國楨海洋史研究方法的不同之處。

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即便史料相同，研究歷程相似，最後結論也不一定相同，這就是學者歷史觀的差異造成的。不同的史觀，不同的思考方式會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學科對相同的東西也會有不同的解釋，誠如德國學者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歷史知識理論》中所言，「如果我們的學科採用其他學科建立的觀點，用他們的觀點看我們學科的事情，我們會無法掌握以及解釋自己學科獨立的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42）海洋史學作為新興史學領域要想洞悉自己學科的問題，要有自己的觀點，也要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否則，一切都將淪為空談。《瀛海方程》提供的恰是一種關於中國海洋史的研究思考方式——站在海洋看海洋。這是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看海、解讀海的視角、思維模式、思考方式：不再站在陸地看海洋，而是站在海洋活動羣體的角度觀察思考問題；不把研究陸地歷史文化的模式套用於海洋歷史文化研究。

去過海邊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當人站在海邊，會很自然地從陸地向海洋眺望，也用自己在陸地上思考的方式想像海上生活、海上居民的衣食住行、海上社會的組織結構。他們把海洋當成人們通行的一種通道，陸地才是他們生存的空間，陸地給人的感覺是沉穩、固定，也相對閉塞的。而對於生活在海上的漁民、海盜等人來說，大海不僅是一種通道，也是給他們提供衣食住行的地方，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空間。他們會把自己與海洋元素不自覺的聯繫在一起，海洋因素滲透在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當中，是生命的一部份。伴隨

着大海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他們逐漸形成自己的具有海洋特色的歷史文化。

德國的施密特（Carl Schmitt）在《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的開篇就曾提到，「人是一種陸地動物，一種腳踩着陸地的動物。……那是他的立足點和根基，他由此獲得了自己的視角，這也決定他觀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他也曾指出，人有一種空間意識，不同的空間對應不同的生活方式。「對於在海上生活的人來說，陸地乃是其純粹的海洋存在的邊界。我們在堅實的陸地上所獲得的關於時空的觀念在他們看來如此難以理喻。反過來，對大陸人而言，那種純粹的海洋人的世界代表着難以把握的另外一個世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

「人們在堅實的陸地上思考世界的本原，流動的海洋在時間上是無限神秘的，在空間上卻是有限的，由岸確定，陸地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而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礎上的世界觀，是以海洋為基點的世界觀。人們不是由陸地確定海洋，而是由海洋確定陸地，海洋成為存在的實現方式。海洋世界蘊藏着以海為生的文化密碼，……，海洋才是英雄的家園。」（頁30）楊國楨這番論述不僅與施密特的觀點是一致的，而且是其海洋視野下的陸地與海洋的全新闡釋。他認為海洋世界是人類社會大系統下的一個小系統，與農耕世界、遊牧世界相同，也有一個從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體的歷史進程。海洋文明不等於與陸地文明對立，或高於陸地文明的先進形態。海洋世界也不是封閉的社會人文系統，始終和陸地世界發生互動的關係。海洋在世界歷史體系和結構中不應該只是一個陸地文明之間交往聯繫的場所，而且還是一個與農耕世界、遊牧世界對話、交流、互動的角色。如果不能從這個角度去認識海洋，就無從了解真正的海洋人文社會。

張雅娟

廈門大學歷史系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By PATRICK HA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xii, 276pp.**

1899年港英政府接管新界時，曾遭到新界村民的武裝抵抗。在迄今所見的多數史書當中，這一抵抗行動基本被視作規模不大、影響有限的「小插曲」。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前會長夏思義（Patrick Hase）的新著